

买办救国

□吴晓波

“买办”，Comprador，原本是葡萄牙语，用现在通俗说法，就是跨国企业里的中方职业经理人。当年在上海，它被翻译成“糠摆渡”，也就是中洋之间的桥梁。

由于国际贸易初萌于广州，继兴于上海，所以两地附近县城便成了出产买办最多的地方，其中最出名的有广东的香山帮、江苏吴县的东山帮和浙江的宁波帮等。在晚清“四大买办”中，唐廷枢、徐润和郑观应均为广东香山人，席正甫为江苏东山人。

在买办群体中，最值得纪念的人是郑观应(1842—1922年)。

郑出生于买办世家，其叔父等人也为多家洋行的买办，他少年时游历过越南、泰国和新加坡等地；17岁那年，也跟很多同乡一样，到上海宝顺洋行做了一名学徒；到1873年，英商太古洋行创办轮船公司，年轻的郑观应被延聘为总买办。他很有经营谋略，曾经总结出办好轮船公司的十条经验，其中包括用人得当、加速船运周期、降低能耗、多揽客货等等。为了降低能耗和运输费用，他购买的轮船均为烧煤少、行驶快、装货多的新式轮船。在他的经略下，太古轮船公司后来居上，发展得极为迅速，据他自称，“当太古开办之时，只有旧船三艘，力与旗昌争衡，尚属得手，所以逐



郑观应著作《盛世危言》

年添船,获利更厚”。1872年,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,为了办好局务,他将当时名声最大的两个买办、也是郑观应乡亲的唐廷枢和徐润拉了进去。一个很隐秘的事实是,当初唐廷枢为招商局招股,竟暗中说动郑观应出钱入了股,因此,郑也是招商局的一个股东。1877年,郑观应与太古的合同期也正好到了,唐竭力拉拢郑观应入局,太古方面出高价挽留,郑观应再三考虑,还是续签了五年雇佣合同。

很快到了1881年,郑观应的五年合同期眼看又满了。招商局又打起这位经营奇才的主意,这回是李鸿章亲自出马,他向朝廷上奏,恳请将郑观应“一门好善”的事迹载入广东省志和县的县志以示表彰,奏片刚刚写好,盛宣怀就马上抄录了副本寄给郑观应,这对于郑氏家族实在是一个无比荣耀的事情,郑观应自是感激涕零。接下来,在唐、徐和盛三人劝说下,郑观应转投招商局。他说服自己的理由是:招商局目前的经营格局尚不稳健,“若不早日维持,恐难自立,我国无轮船往来各通商口岸,更为外人所欺辱”。最后七字,是来自郑观应的内心召唤。

1882年2月,郑观应与太古的合约期满,3月,他接受李鸿章的委札,就任招商局帮办一职。

买办生涯如此稳定而多金,唐、徐、郑三个香山人却相继弃之转投,究其原因,除了商业利益的评估外,更大的冲动应来自于他们对国家的报效之心。

买办一族,是当时中国人最早接受“西风”的,也可以说是最先开化的。他们天天与外商接触,有的还从小接受英美教育,对先进的商业理念和现代国家观念有深刻的认识。而在这过程中,他们也对中国落后和国民之愚昧最有切肤之痛。唐廷枢的同学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,也在上海宝川洋行当过一段时间的买办,他

回忆说,“买办之俸虽优,然操业近卑鄙”、“以买办之身份,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也”。这种低人一等的屈辱感,深嵌在很多买办的人格中。因此,国家稍有召唤,他们自会义无反顾。这些人中,以郑观应的观念最为先进,他被认为是近代史上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改良思想家。

要商战,首先要学西方,“效其技艺,臻于富强”。这一观念并不新鲜,自魏源之后,时人俱有此论,这在当时的洋务派已成共识,超人之处在于,郑观应继而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述。

第一,他从孟子“国以民为本”的民本思想出发,出人意料地引导出民间资本是商战主角的结论。

第二,郑观应认为徒慕西方的技艺之长是远远不够的,还必须“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”,这个大旨本源就是改良政治,“仿泰西之良法”,实行君主立宪。

然而,郑观应在招商局的日子过得并不愉快。到1884年,唐廷枢和徐润相继被盛宣怀赶出招商局,郑观应成孤鸿一只。其后十年间,洋务派再无大的建树。

1894年7月,清朝与日本爆发战事,史称“甲午战争”。在这一激荡时刻,郑观应因《盛世危言》一书再成焦点人物。

郑观应在过去的十年里,一边忙着为盛宣怀打理各地的实业事务,一边还在完善着他的变革思想。1894年春夏,当甲午海战开打的前后,他刊印了五卷本的《盛世危言》。他自称,“时势变迁,大局愈危,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。”在这部书中,他继续呼吁“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”,提出创办新式银行、平等中外税收、收回海关权、铸造简便通货等等切实可行的措施。他更大胆地提出向日本学习,这种务实气魄绝非寻常书生可比。另外,更为重要的是,他比十年前更为清晰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,内容包括实行立宪、设立议

院、进行公开选举,他坚定地写道,“政治不改良,实业万难兴盛”。

也是在1894年前后,郑观应还向朝廷推荐过一个年轻人,他就是日后推翻帝国的孙中山。

孙文跟郑观应一样,也是广东香山人——后来这个县因此更名为中山县(市)。1894年4月,就在中日战事将起之际,孙文写出洋洋八千言的《上李傅相书》,6月,专赴天津向李鸿章投书。在这封信中,年轻的孙文对发展农、工、商、学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鸿文既成,需托人推荐,孙文找到了香山同乡郑观应。郑写信给盛宣怀,请他转达。史料显示,李鸿章对孙文的投书毫无反应,后者自此决意告别改良,投诸暴力,以血腥革命的激进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。

郑观应与盛宣怀互相欣赏,是一辈子的好朋友,他们是当世最杰出的实业家,在胸怀抱负、思想高度、战略眼光和经营能力上可谓一时瑜亮。不过,他们在官督商办的理念上却始终格格不入,郑信仰民本主义,对官商体制从来深有不满意,十多年前唐廷枢、徐润在招商局的下场更是寒透了我的心。可是,他对盛又有知遇之心,也很想借盛的官府背景和强势力量振兴国家实业。这种矛盾心态纠缠了他的一生。

郑观应逝于1922年,晚景萧条。当年的三个大买办先后都毅然告别优厚且能世袭的洋行生涯,转而为朝廷所用。日后让人唏嘘不已的是,唐、徐、郑三人自投身于官督商办事业之后,其经历竟是同样的坎坷悲情。唐廷枢逝于1892年,据当时人称“身后萧条,子嗣靡依,未能稍食其报。”徐润后来被盛宣怀赶出招商局,又经历多年磨难,逝于1911年,所积财富不过万两。人生运势随国运而动荡,是非得失如此诡异,让后来者一言难尽。

(摘自《经济观察报》)